



2006 年,《图谱》部分作者合影。左起:项目发起人王曾瑜,编写者陈奕玲、黄正建、栾成显、陈绍棣、郭文玲。

王曾瑜供图



2017 年,《图谱》部分作者合影。一排左起:编写者沈冬梅、栾成显,项目发起人王曾瑜,编写者陈绍棣、黄正建、郭文玲;二排左起:编写者陈奕玲、关树东,已故作者安守仁之子安明,编写者党宝海、赵凯。

◀ (上接 7 版)

“可能无人做”的婉拒后,《图谱》编写者终于逐步找齐了。当年 3 月 26 日上午 9 点,新成立的图谱组第一次开会。根据黄正建的记录,当天会议的到场者有王曾瑜、张永山、许文骥、沈冬梅、关树东、李锡厚、陈绍棣、黄正建、陈奕玲、赵凯、鱼宏亮、刘晓,没有到场的有栾成显、罗琨、安守仁等。会议一直进行到中午,黄正建向与会者介绍了情况,念了体例,大家看了样稿。关树东记得,那时他博士即将毕业,王曾瑜对他说:“你写完论文,就该做《图谱》了。”

在 2004 年《图谱》再度立项时,黄正建就在日记中写道:“王曾瑜对此事极认真,极负责。”2005 年,社科院院部与王曾瑜签订了重大课题责任书。不过,在现在出版的《图谱》编委名单中,却看不到王曾瑜的名字。“是我要求出版社不署名的。”王曾瑜说,他在立项时就提出 8 个字:一不挂名,二不沾利。在最后的统稿和审稿阶段,王曾瑜承担了大量审读工作。他说:“在张先生面前,说我是四分之一瓶醋,还是过高抬举自己了。这是实事求是,不是妄自菲薄。我对《图谱》就像对待自己的著作一样,必须尽学力修改。”为此,他还常常向师母傅学苓先生汇报编写情况。不过,直到结项,王曾瑜都坚持不肯要一文钱稿费。“做这个事情,越简单纯粹越好。”他说,“我对这部书只有一个要求——绝不能再‘下马’!”

“不完全是付出”

“看到这套书出来,晚上终于能睡踏实了。”在社科院历史所办公室里,看着刚刚从出版社快递来的《图谱》,栾成显笑出了声。今年 76 岁的他,是整

个《图谱》项目作者团队中,一人独立承担最多卷册的作者。17 册书里有 4 本,即《明代卷》(上、下)和《清代卷》(上、下),是由他主笔的。

其实,《明代卷》(上、下)的作者一开始并不是栾成显。之前,《明代卷》上、下两册已经由安守仁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韦祖辉撰写了底稿。但旧有的稿件在体例和结构上与其他卷册极不统一,需要大规模的重新加工。在 2004 年项目启动后不久,安先生就过世了,韦先生年事已高不便继续从事《图谱》工作。栾成显说,这也反映了《图谱》写作的一大困难——由于时间线拉得太长,人员变动频繁。从 2004 年立项到 2016 年交稿为计,时间就过去了 10 多年,更不用说整个项目 60 年间的人员变化,而“换一个人,就是重来一遍”。

如果《明代卷》工作搁浅,将影响整个《图谱》的出版,编写组和出版社都心急如焚。考虑到正在编写《清代卷》(上、下)的栾成显是明史专家,虽然明知栾老工作量大,但编委会不得不又找到了他。“在这种情况下,我二话没说就答应了。”栾成显说。

不料想,2015 年中旬,就在距离截稿期越来越近之时,栾成显的糖尿病病情加重了。见工作进度一下子慢了下来,栾成显心里非常着急,几次给出版社打电话致歉。那时候出版社也急,又不忍心催促病中的老先生。最后,他们和栾成显讨论出了一个方案——让编辑入驻栾家,与他一起工作。这样,配图问题就能现场讨论解决,有的文字部分则采用栾成显口述、编辑打字的方式完成。

栾成显告诉记者,最初的安排是早上 9 点开始工作,中午休息 1 小时,下午 5 点结束。执行了一天之后,他觉得进度太慢,要求改为每天晚上 9 点结束工作。经过 15 天高强度的

“最后冲刺”,栾成显和编辑完成了《明代卷》与《清代卷》共 4 册的组稿,整理文字近 90 万、图片 2934 张。

“做《图谱》,栾先生的拼命是出了名的。”关树东说,栾成显知道自己承担的任务最重,为了赶上进度,70 多岁的他有段时间每天都工作到凌晨一两点。听到这,栾成显说,那主要是因为他原本是研究明史的,“做清代史相当于重学”,花费了不少时间。他笑着对记者说:“你看,做《图谱》还能学到新知识,也不完全是付出嘛!”

“最大的文件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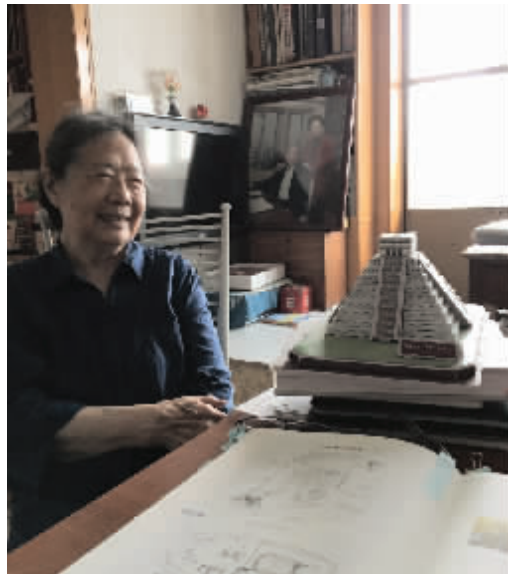
在很多编者的电脑中,“图谱”资料通常是占内存最大的文件夹。关树东告诉记者,现在《图谱》每册用图为 400 张左右,但在提交初稿时,考虑到资金、版权等问题,每位作者备选的图片在 800 张左右。而在收集资料阶段,每个人都是在

8000 甚至上万张图片中进行挑选的,“大家都准备了 10 倍以上的资料”。

《图谱》常务编委、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罗琨和丈夫张永山(已故)1963 年一同进入社科院历史所先秦史研究室工作。1980 年代,为了加强《图谱》的编辑工作,历史所安排张永山、罗琨协助张政烺先生完成原先由他承担的原始社会和夏商西周两大部分的《图谱》工作。罗琨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系,对原始社会阶段的历史很有兴趣,一直关心相关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她记得,接到这项工作安排两周后,她就提交了原始社会选图目录约百条,“当时我们住在建外 9 号楼,张先生住 7 号楼,往来很方便,拿着目录,先生很高兴,他说要亲自翻拍图版”。走进罗琨家中,只见书房里排着一列大文件夹,过厅堆放着十余个卡片盒。“都是我们夫妇俩做《图谱》等先秦史研究时攒下的部分资料。”罗琨说。

记者翻开罗琨主编的《原始社会卷》,看到第二章太初之民的第一节直立人文字概述加上所有图片,共 7 页篇幅。与罗琨聊起这个话题时,罗琨常常边抛出观点,边起身去书房里搬出一本本厚厚的文件夹,在 2、3 秒内翻到相关页面点读。记者取过其中一本文件夹,只见在页面右侧依次贴着写有“起源”、“旧石器时代”、“江苏安徽福建”、“四川”、“两广青海”等七八个条目的小纸片,每个条目下有数十页文件。文件一部分是剪报,有的来自《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文物报》等专业报纸,有的来自《北京晨报》《南方周末》等大众媒体;一部分是专业期刊上相关文章的复印件,从时间上来看,2000 年后的学术成果占大多数。记者又翻开另一本文件夹,从页面右侧目录来看,是“湖北”“河南”“广西”等地名。在“湖北”目录下,夹着一张张打印稿,以

(下转 9 版) ➡



左上图:编写者罗琨的准备资料文件夹。

左下图:罗琨整理的编写资料,第二幅图为她选择的陶鸮鼎。

右图:罗琨从网上买来玛雅金字塔拼接模型与良渚时期高台土家线描图做比较。

本报记者 单颖文摄